

江苏人民出版社

『性别屏蔽』是近年来女性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它严重制约着女性艺术活动的成长空间和发展走向。本书作者均为我国文学、艺术和评论、研究界的佼佼者，他（她）有机会在『女性文学与艺术』这个题目下汇聚一堂，就『性别』因素对创作的影响坦诚陈述自己的见解，突破单艺术形式和单一性别视角的封闭结构，提倡男女两性性别立场和视角的对比与置换，创建不同艺术表述形式间的沟通渠道，在经验与理性的交锋中深化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从而在突破『性别屏蔽』和『门户壁垒』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性别论坛

主持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

文学、艺术与性别

李小江等 著

己立立人
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
天人合一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持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

文学、艺术与性别

李小江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艺术与性别 / 李小江等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0
(性别论坛)

I. 文... II. 李...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②女性-艺术-研究-中国 IV. ①I206②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868 号

书 名 文学、艺术与性别
著 者 李小江等
责任编辑 张慕贞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9×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页 2
印 数 1—3 130 册
字 数 257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177-9/G·1058
定 价 17.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性别屏蔽”是近年来女性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它严重制约着女性艺术活动的成长空间和发展走向。

本书作者均为我国文学、艺术和评论、研究界的佼佼者，他（她）有机会在“女性文学与艺术”这个题目下汇聚一堂，就“性别”因素对创作的影响坦诚陈述自己的见解，突破单一艺术形式和单一性别视角的封闭结构，提倡男女两性性别立场和视角的对比与置换，创建不同艺术表述形式间的沟通渠道，在经验与理性的交锋中深化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从而在突破“性别屏蔽”和“门户壁垒”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前 言

前

言



QIAN

YAN

本书在“女性与文学艺术”圆桌座谈会的基础上辑稿整理而成。

就女性而言,谈文学或艺术,在相对封闭的领域中我们已经滞留了太长时间:滞留在女性自身范围内,滞留在妇女研究学人的小圈子里,滞留在单一艺术门类或单一学科框架中,自说自话,孤芳自赏;在确立自我主体身份的同时,可能窒息了继续成长的学术空间。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在研究领域,也出现在创作中——“性别屏蔽”在当下成为女性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不尽来自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局限,也可能出自我们的观念和我们为抗争传统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经过近一年的策划、协商和前期对话,“女性与文学艺术”圆桌座谈会于2001年6月16—18日在大连大学举行。这次学术活动以女性艺术文本和女性间的对话为主,吸纳男性研究者的分析和男性视角,突破单一学科研究、单一艺术形式、单一性别视角的封闭结构,力求在多维度“差异性”研究的基础上拓展思维和表述空间,尝试将性别研究方法用于“有性的”创作主体和文本分析,突现艺术(包括性别因素在内)的个性表现张力,在经



验与理性的交锋中深化对文学艺术的认识。

前期对话和座谈的参与者均为当下国内有影响的作家、画家、研究者和评论家，以两种形式参与此次学术活动：

一是会前的“对话”：研究者与创作者面对面对话，现场录音，将录音资料整理成有效文字，在会前发至所有与会人阅读。

二是与会者参加“座谈”：所有与会者会前阅读“对话”，有备而至，就“个人立场”做10~15分钟的简短发言，然后在相关主题下自由讨论。

座谈会的议题有两个：

1. 各自表述：性别视角与个人立场；
2. 个体差异：艺术形式与生活印记。

这次学术活动为“文学、艺术与性别”课题之一，本期座谈以女性文本分析为主，具有如下特点：

- 以文学艺术研究者与创作者的开放式对话为基础；
- 推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创作主体间的交流；
- 提倡男女两性性别立场和视角的对比与置换；
- 创建不同艺术表述形式间的沟通渠道。

所有这些特点无非一个目的：突破“性别屏蔽”和“门户壁垒”，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充分调动本土资源，为女性创作和妇女/性别研究拓展成长空间。

李小江

目 录

目

前 言 1

录



C
U

前期对话

对话文本

张抗战 VS 李小江	女性身份:研究与写作	3
王安忆 VS 刘金冬	我是女性主义者吗?	29
骆晓戈 VS 彭燕郊	女性主义与诗学	56
林 白 VS 荒 林	写作:在生活之外	75
陈 染 VS 荒 林	文本内外	91
虹 影 VS 崔卫平	将一种幽暗带到光亮之中	103
申 玲 VS 陶咏白	平平淡淡才是真	111
喻 红 VS 徐 虹	对人的成长的一种关注	125
董 枫 VS 廖 雯	生命可以栖居的结构	146
毕淑敏 VS 刘金冬、张祖立	更多地关注人的生存状态 ...	161

1



交流文本

- 贾方舟 性别身份的自我定义
——关于“男性艺术”的思考与个案分析 171
徐 虹 女艺术家的文化环境和创作空间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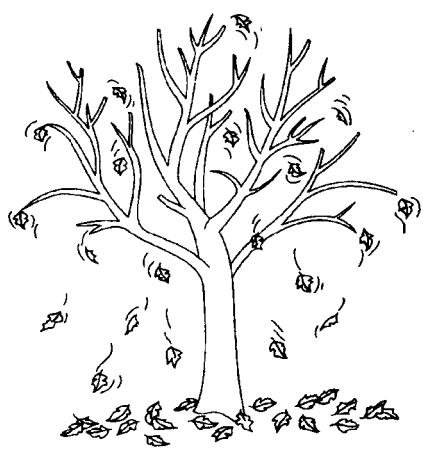
现场交流

- 座谈一 各自表述：性别视角与个人立场 193
现场对话
喻 红 VS 徐 虹、贾方舟 对话一 245
申 玲 VS 陶咏白、贾方舟 对话二 253
张抗抗 VS 刘慧英、荒 林、王红旗 对话三 263
骆晓戈 VS 吴思敬、顾 骊、李小江 对话四 275
座谈二 个体差异：艺术形式与生活印记 283



前期对话

qianqiduihua



对话文本

前期对话



QIAN QI DAI HUA

张抗抗 VS 李小江 女性身份：研究与写作

时 间：2000 年 2 月 2 日、2 月 13 日

地 点：北京颐和山庄

张抗抗：女，作家

李小江：女，大连大学教授

张抗抗(张)：有时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好像做妇女研究的人，除了妇女问题，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关心。或者面对任何一种事物，都会用女性主义的标尺去衡量。

李小江(李)：这是事实。西方女权主义有这个问题，但它有它的道理：你这个男性中心的社会不管我，我管你干什么！我就是要跟你对着干。我们这里的问题则确实与视野和知识积累有关，年轻一些的女学者又在走两个极端，要么看重了学问，有意与妇女研究划清界限，要么就一屁股坐到女权主义立场上。

3



在西方,或许不错,女权关怀可能就是社会关怀;但在我这里,在发展中国家,单纯的女权关怀有时与社会关怀有不少距离。女权主义立场与一般社会立场会有冲突。

张: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女性问题是不能够单独成立的,它一定是和整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联,我作品中所写的女性人物,都是以“人”为出发点的。

李:但有趣的是,国内女作家中,对“妇女”问题正式发言的恰恰是你。早在20世纪80年代,你那篇《两个世界》刚出来,我就注意到你。

张:起因是,1985年我到德国去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他们给我们出的题目:希望谈谈中国女性文学。当我接受这个发言后再来思考,发现(当时国内)根本就没有女性文学,所以才会有那篇发言。就像人家问你,你为什么要翻译那个《第二性》,可中国根本没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在1985年的时候,女性文学或是处于萌芽状态,或是在此之前根本没有人提过。我就这个问题发言,都是非常感性的认识,谈不上什么理论,是自己直观的东西,对国外的女权主义所知甚少,所以没有什么顾忌。记得当时咱俩有一段通信,你对我这篇文章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我很不以为然。

李:除了你的这篇文章以外,实际上你的核心思想是“两性”而不是“女性”,两性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声音,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第二个是1990年初,我在郑州开会,是一次国际妇女研讨会。你给我回了一封信,内容不多,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说你马上要到黑龙江参加作协的会,后面加了一句,“现在事事烦乱,无心顾及妇女的事”。

张:别忘了那是1990年,很特殊的情况。当人的尊严都没有的时候,哪儿还有女性尊严?



李：实际上这也是你一贯的态度，锦华在这点上对你的批评，某种意义上，我是赞同的。在你的意识中，“人”的东西是第一位的，女性的东西是第二位的，并没有想到女性的事情也是人的一部分。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都在说，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人权问题没有解决，谈什么女权？人的平等尊严都没有，还谈什么男女平等问题？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声音，是“非性化”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锦华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你的态度似乎有些变化。

张：你认为主要是什么变化？

李：昨天我找出你的三本书来看，我认为你的三部长篇是三个阶段。比如《隐形伴侣》，在某种程度上是知青小说，1985年出版，“文革”刚结束，我们自己整个的身份模糊了，我们对自己的清理不可能不重新开始。这实际上是80年代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知青出身的人，对个人身份的清理。你的《赤彤丹朱》是一本非常有分量的书，可惜出的不是时候。为什么说它出的不是时候？它正好掉在了商品经济大潮中！没人去关心重大历史问题，加上后现代批评一时喧嚣，不仅不能分析和挖掘它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反而有可能扣上“宏大叙事”的帽子。你的三部长篇表现了你在时代进程中思想和自我认识的变化。

张：但我觉得它们都有缺欠，虽然都是有特色、有个性的作品，但还不够成熟。

李：它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每一部都是一个成长。比如第一部《隐形伴侣》，对个人、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历史的清理。第二部《赤彤丹朱》，实际上是对体制的反省，对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抱有深深的忧患。第三部《情爱画廊》，作为一个作家或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对市场这样一种挑战，自己做出一种积极的尝试，不管在艺术上成功不成功，这种探索是

可贵的，一直处在爬坡的过程中，尽管这个坡爬得比较艰难。

我们的对话有时也很有意思，尽管你说我比较开阔，但我的性别立场是非常坚定而鲜明的。在我的生活中并不特别坚持女性的立场，不是说所有的女性都是好的。过去我也不认同女人，所以写了《走向女人》。但是后来，就把这个价值张扬得和天一样大，因为这个“半边天”其实从来少见天日，总是在男性文化和男性权势的阴霾下过日子，包括做学问，很难挺起腰杆。而在你的创作中，确确实实可以感到，在性别问题上你一直没有抬起头来，所以想听听你自己的看法。

张：我自己想得不一定很明白，认识某种事物，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有些东西是原来没有意识到的，后来意识到了；有些想法会修正，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坚持原先的出发点。我先说一个问题：我在童年或少年时代一直受到原来体制的极大伤害。从经验、经历、感情上逐渐形成自己对它感性的认识，然后才是理性的。那么你不同，因为你的家庭背景是顺利的，在童年时代心灵上没有很深厚的阴影，不像我的家庭出身，它一直压迫着我。所以我对人权、自由，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作为旧体制的叛逆者，我和你不同，你出于理性，而我是出于切身体验，由许多切肤之痛汇合而成。你在少年、青年时代没有受到社会的排斥，这种反叛更不容易。

我对女性立场也有疑问，为什么我的作品中较少表现自己的性别意识？为什么不能进入女性写作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我一直坚持的那个立场：当人的尊严都没有的时候，何谈女性？这不是把它放在第二性的位置上，而是放在母项和子项上，是这样一种分别。“人”是一个统称。西方喜欢把日子放在前边，把年份放在最后，它是先把子项、把个体突出在前边。按中国的思维方式，先把人看做一个整体，然后它的分类是男人



和女人。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旧体制下面生活所感受到的压力，是一个人的尊严的问题，是受压迫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自由的问题。所以我依然很难改变自己的看法，仍然认为人的概念包含男性和女性，是两性共有的。讲女性必然要有对应的男性，女性之外的文学难道可称为男性文学吗？女性主义解释说，因为他们是主流，女性处于边缘状态。但是事实上，我在精神上一再受伤，都是由于这个体制的强权所带给我的压迫。反抗是自己对尊严的维护，我认为这个没有错。我始终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不是我站到男性立场上去了，也不是我站到女性的立场上去了，我是站到一个人的立场上了。

第二个疑点，也是不断被批评的，比如我说，我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才是一个女作家，这大概算是我的名言。我反省自己，为什么在写作时没有很强烈的性别意识，是不是由于我本身有一种对女性的忽视，或者说女性自卑，还是说本身已被男性文化统治了，同化了，湮没了，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性别意识？但另一种可能却是这样的：在我的感觉中，在我心灵中，在我的存在中，我从来就认为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比如在我的家庭中，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生了两个女儿——我和我妹妹，没有男孩，但我从未因自己是女孩而受到冷淡。在我成长过程中，没有特别感到性别的歧视。我对旧体制的反抗欲望要远远大于我对于男性的反抗，为什么？因为我很少体会到男性压迫。我在小学里是个大队长，五年级就发表了作品，很少受到性别歧视，没有因为是女生就怎样。后来我进了杭州最好的中学，初二时我的班干部被撤职了，是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当时我是文艺委员，在学校排戏，男生都很听我的话，作文比赛还得了奖。我从来没有经受过因为我是女孩子而受挫折。我家两个女孩，没有哥哥和弟弟，但父母说女孩好，从没有坚持要生男孩。



我分析自己的心理过程,就像一个人在很饿的情况下才会特别想吃东西;如果不饿,有没有食物就不重要。我从未经历过性别歧视,所以觉得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后来到了农场,我的个人生活经受了很大的挫折,20岁结婚,又很快离婚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仍然没有受到一种根本的女性伤害。我也从未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之下。在日常生活中,从小我就是很女性的,感情上有点早熟,即便处在20世纪70年代也不是铁姑娘那种。所以,应该说,我很早就认为“男女不一样”。

李:这个很奇怪,一般人在婚姻中会对性别很有感觉。

张:离婚以后,换了一个连队,周围的人也没有对我太不友好,即使有,也不是来自男性的,而是当时“左”的意识形态。而恰恰,那些刁难我、非议我的人,大多是女生。这给我很深的触动。但我习惯于我行我素,从离婚以后就开始写作,1972年第一篇小小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来很快又发表别的东西。就是说,我一直跟男性在一个起跑线上。

李:我就是奇怪这事,生育怎么可能对一个女人没有任何影响?在《隐形伴侣》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就是你谈生育。当时我并不知道你的个人经历,但我在想,这只有一个生育过的女人才写得出来。

张:生孩子其实并没有使我特别懊丧,女人能生孩子,我觉得挺了不起的。我懊丧的是,孩子出生以后,我已经感觉到孩子的父亲并非是我原先想像的那样。

李:但跟性别意识是两回事?

张:我指的是女性在生活中受到男性压迫而产生的那种明确的性别反抗意识,我一直是淡的。从我个人的性格来讲,可能还是有文学给予的一种浪漫,充满幻想却又能无情地打碎它。就是说能够面对这种现实,能够作出选择。比如说,我和他恋爱



当初，父母不同意，我就跑到黑龙江去了。很多反常行为都是文学造成的，也可能有遗传，使我做了一系列反常的事情。我们离婚很顺利，我个人心理上仍然没有觉得受到伤害。农场的知青对我有看法，也不能把我怎样，尽管会在背后说坏话，但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1972年10月，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小说。在当时，能发表作品，周围的人就会对你刮目相看，这种阴影也就慢慢地消散。我请假在上海改稿期间，农场就有写匿名信的，什么家庭出身不好、小资产阶级情调等。这些周围所有的暗箭也好，明枪也好，并不是男生看不起女生造成的，其中一部分甚至来自于女人对我看不惯。所以后来我总有点害怕女人，总是讲女人要正视自己的弱点，你别总说男人压迫你们啊，本身问题在于你们得提高自己，我比较多的立足点都是放在这里边的。

李：弱势群体追随主流价值观念，往往表现得比那个东西更过分，比左还左。

张：个人经验太有关系了。我讲的都是自己真实的心理根源，可以分析。记得你好像说过，一个从不把男权放在眼里的女性，通常不会成为女性主义者。

李：这种特殊的语境是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和我们特殊的历境遇造成的。

张：对呀，在我的知青回忆录《大荒冰河》中，写“文革”十年，其实都围绕着关于“自由”的情结。

李：你所有的书，包括《情爱画廊》，基本上也是回避了性别问题，也可能是你刚才说的“没意识”。

张：其实《情爱画廊》中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探讨女性话题了，包括性和爱的关系等等。但女性批评者仍然认为远远不够。后来我想，那些女性主义研究者为什么非要这样要求我呀？为